

# 充分认识“四个有利于”的重要政治优势

孙玮珠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四个有利于”密切相连、相互贯通、有机统一，既从不同维度回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又揭示了党之治的重要密码；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又遵循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律；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又注重对治理效能、战略方法与发展方式的科学把握。推动“十五五”规划纲要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并充分利用好“四个有利于”的重要政治优势，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具体、现实的，更是全面、系统的。制定实施五年规划通过制度化方式将党的领导转化为治理实践，并建立健全规划实施机制，确保规划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形成从党的主张到国家意志再到全社会共同行动的完整链条，推动党的领导更好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这四个方面能力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既是五年规划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的生动展现，也为进一步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发挥五年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凝聚磅礴力量。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党的政治领导力主要体现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具有方向性、原则性、纲领性，是各地区各部门开展工作的重要遵循。在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中，党的政治领导力主要体现在能够保证规划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全党思想不断取得新成就。党的思想引领力主要体现在党推进理论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中，党的思想引领力能够保证规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全党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使全体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不断筑牢全社会干事创业的思想根基。党的群众组织力主要体现在党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落到实处。在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中，党的群众组织力主要体现在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人民群众清晰认同发展目标、感知发展方向、参与发展过

程。党的社会号召力主要体现在党对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群体、各方力量的号召能力，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淬炼而成的。在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中，党的社会号召力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顺利实施，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党的政治领导力定方向、谋大局，以党的思想引领力凝共识、聚人心，以党的群众组织力筑根基、提效能，以党的社会号召力汇合力、聚伟力，推动全社会形成共促发展的良好局面，确保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指标、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等，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推动相关战略部署落地生根、见实见效。

## 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力有序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正是将这一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重要载体。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上，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历史进程中，集中力量建设了一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极大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也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用好五年规划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发挥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引领作用。通过推进实施“十三五”165项、“十四五”102项重大工程项目，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并圆满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任务；整合优势科技资源，开展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步伐明显加快；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实践证明，五年规划能够持续集中力量，攻克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与关键难题。

制定实施五年规划之所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系统化、程序化的实践路径，既确保“集中力量”的可能，更保障“办成大事”的必然，推动实现制度优势向发展优势的转化。比如，五年规划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既是“集中力量”的最大政治优势，也为“办成大事”提供根本政治保证。又如，五年规划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科学统筹、加强宏观调控、提升政策效能等，动员资本、技术、人才等各类资源向国家战略目标集聚，更好实现国家战略意图、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再如，五年规划通过引导中央财政资金优先投向国家发展规划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等，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推动相关战略部署落地生根、见实见效。

## 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更好发挥战略导向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五年规划是科学、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的重要支撑，能够以制度化的中长期视野研判历史发展大势，立足现实统筹全局、科学分析机遇挑战，并以战略定力推动落实，使国家发展目标保持方向明确、目标清晰、步伐稳健。

加强战略预判，分析发展大势。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前提是精准研判时代发展大势、科学识别机遇挑战。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突破，对提升战略预判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党着眼历史演进、时代大潮、全球风云分析机理、把握规律，科学研判发展环境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定实施五年规划，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的基本思路，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重要条件。

开展战略谋划，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实施五年规划坚持全国一盘棋，运用系统观念统筹各方关系，加强顶层设计。在规划制定前，通过全面实施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前瞻性、关键性、深层次重大问题，统筹考虑要素支撑条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财政承受能力等重大风险防范等因素，实现对战略问题的系统性布局。在规划实施中，统筹各级各类规划编制，加强规划间衔接协调，加强上下贯通、协调联动，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保障战略布局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增强战略主动，防范化解风险。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不仅要把握发展机遇，更要主动防范化解风险，这是保障国家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前提。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也是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过程。五年规划在制定过程中能够系统研判、提前发现影响长远发展的瓶颈与隐患，将重大风险防范纳入战略安排考虑；在实施过程中，能够在落实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的过程中，推动风险防范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布局，促进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化解，不断增强国家发展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做到防患于未然。

## 保持事业连续性，不断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步一步坚定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从而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保证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保持事业连续性，实质上就是国家各项事业的长期推进过程中，能够坚守长远目标，推动已经取得的优势得到巩固拓展、制约发展的瓶颈得到有效克服、影响全局的短板得到补齐补强，使下一个阶段发展根基更稳、韧性更强，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持续发展。五年规划作为接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制度安排，为保持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连续性、推动“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锚定长远目标，确保事业连续性的方向。事业连续性的首要前提，是始终坚守明确的长远发展方向。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在规划期内的阶段部署和安排，五年规划立足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将国家长远战略目标分解为一个可落地、可检验的阶段性任务，为确保各项事业连续性发展锚定方向、明确路径。

构建接力机制，强化事业连续性的保障。实施五年规划是新长征路上的“接力跑”，每个五年规划既是对前一个五年规划的接续传承，也是对下一个五年规划的铺垫引领。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既同上一期规划提出的理念和思路保持连续性，又准确把握未来5年我国发展大势，提出符合实际、具有前瞻性的总体思路、重大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形成了“传承—推进—提升”的良性循环。

巩固传承成果，夯实事业连续性的基础。保持事业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就在于对既有发展成果的巩固与传承。五年规划的制定实施坚持国内和国际相统筹、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贯通、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战略性与操作性相统一，注重对阶段性成果的总结、巩固与传承，将上一个五年的发展成果作为下一个五年的发展起点，能够实现各项事业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不断夯实事业连续发展的基础。

推动贯彻落实，走好保持事业连续性的必由之路。规划的生命在于执行。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实施好五年规划，将规划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就是在接力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就能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比如，“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加强规划实施保障”作出部署，提出强化党对规划实施全过程的领导、健全规划实施全周期推进机制，能够有力有序推进各项任务实施，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作者为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原载4月17日《人民日报》）

# 统筹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张成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扩大就业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相结合，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质生产力既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也深刻影响就业结构和就业形态的变化。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统筹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使产业升级与就业结构优化同步，实现创新驱动与就业扩容的协调联动。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同时，技术进步呈现明显的技能偏向特征，即对高技能劳动者需求上升，对中低技能岗位形成替代压力，就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集中显现。要在尊重技术进步内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协调联动。既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拓展就业增长空间，使技术进步成为提升劳动生产率与优化就业结构的重要动力；又使高质量充分就业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条件，充分利用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这个宝贵的发展资源。

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与就业创造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不断深化优化社会分工，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要引导技术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通过技术赋能劳动、激励企业运用新技术提升劳动者能力、

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劳动效率，推动技术创新更好服务于人的发展。同时，重视并防范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构性就业冲击，健全就业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对受技术冲击影响的劳动者及时开展职业培训。

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夯实发展基础。产业是就业的载体。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必须把就业考量寓于产业发展。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培育新动能的同时塑造新的就业增长空间。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通过产业链延伸和业态创新，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和岗位稳定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创造更多知识型、技能型就业机会。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快银发经济、托育服务、健康服务和社区服务发展，在满足多样化民生需求的同时拓展就业增长空间。

提升劳动者就业适配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其适应产业变革和技术进步的能力，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根本之策。要着眼人的全面发展和长远发展，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工作，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高素质劳动者队伍，充分释放人才红利。健全以能力提升为导向的终身技能培育机制，加强技能培训与岗位需求对接，引导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同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提升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完善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让各类人才各展其长、各尽其能，不断提升就业结构动态调整 and 适应产业变革的能力。”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原载4月17日《人民日报》）

# 培育适应信息技术发展形势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李梦云

人才是第一资源，文化人才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育人、建队伍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统筹各类人才培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对信息化条件下的文化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培育适应信息技术发展形势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信息技术已成为影响文化创新创造的关键变量，急需培育熟练掌握信息技术、善于运用信息技术的跨学科复合型高水平文化人才。目前，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存在培养体系与数字信息生态发展脱节、产学研融合程度不足、供需匹配度较低、人才评价体系滞后、适应新型文化业态岗位与技能需要的人才缺乏等问题。“十五五”时期，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从精准把握人才需求导向，优化人才培养体系、营造人才发展良好生态等方面入手，培育、汇聚和壮大一批既深谙文化生产创作又掌握前沿技术的多层次、复合型人才。

坚持需求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明确需求方能有的放矢。要立足国家发展战略、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精准把握文化人才需求导向，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配性。导致当前文化和科技协同创新力量有待进一步提升、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动能不足、文化领域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与装备还未实现自主化等突出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与科技融合型人才短缺。要系统谋划文化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推动文化人才强化融入技术发展的意识，提升驾驭技术的能力、开拓应用技术的场景，更好解决文化与科技脱节问题，实现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使人才培养真正服务于文化数字化战略目标。可建立动态需求监测机制，依托信息技术工具精准识别和分析文化产业中的新兴岗位能力需求、技术应用趋势与人才缺口，将文化领域中技术应用领域的痛点、堵点与具体需求转化为人才培养的靶向目标。明确不同层级与不同类型文化人才的能力以精准匹配，比如，对基础人才侧重信息工具使用培训，对领军人才强化技术创新与文化融合的战略思维培养等。通过信息系统建立需求反馈闭环机制，持续跟踪文化人才在技术应用中的适配情况，确保需求导向始终贴合技术赋能的实践场景，实现文化为科技铸魂、科技为文化赋能的双向奔赴。

优化培养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培育兼具人文素养、技术运用能力与跨学科整合能力的高素质文化人才，推动教育变革是关键一环。面对这一复合型人才要求，传统文化人才培养模式在学科划分、课程设置、教学范式等方面存在滞后性，理论与实践“两张皮”、跨学科交叉融合培养不足等现象比较突出，亟待系统性推进文化人才培养体系创新。要构建分层分类、交叉融合的学科专业体系。鼓励各类教育主体立足实际，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强化信息化课程教材与师资建设。构建贯穿全程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在基础教育到继续教育的各阶段系统融入人工智能等技术素养课程，开展多层次、模块化数字技能培训，提高文化人才技术应用能力与跨学科整合能力。推动围绕文化数据治理、数字文化新业态等前沿方向开展协同攻关，进一步将实验室里的技术与算法模型转化为推动文化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实际应用。构建一批具有示范性、数字化应用前景、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使其在实践中融会贯通、锤炼本领。完善协同机制，打破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之间的壁垒，积极推广“政府—高校—企业”多方协同的培养模式，建立“政产学研用”联合育人机制，依托“双师型”导师队伍的协同带动作用，实现理论与现实的双向赋能，弥合学校教育与实践需求的鸿沟。

营造良好生态。制度环境是人才汇聚与成长的土壤。信息技术迭代更新的快速性与文化价值沉淀的长期性，要求文化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必须具备足够的敏感性与包容性。目前，适应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协同管理机制尚不完善，鼓励创新的平台标准与激励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需从制度供给、政策扶持、评价激励、融合发展四个维度精准发力，形成协同推进的良好生态。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厘清文化建设领域运用信息技术的权限范围与伦理底线，界定数字文化产品产权归属，规范收益分配方式。进一步完善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容错纠错机制与监管体系，既为文化人才的技术创新松绑，又筑牢风险防控底线。完善政策支持机制，依托信息技术工具精准识别和分析文化产业中的新兴岗位能力需求、技术应用趋势与人才缺口，将文化领域中技术应用领域的痛点、堵点与具体需求转化为人才培养的靶向目标。明确不同层级与不同类型文化人才的能力以精准匹配，比如，对基础人才侧重信息工具使用培训，对领军人才强化技术创新与文化融合的战略思维培养等。通过信息系统建立需求反馈闭环机制，持续跟踪文化人才在技术应用中的适配情况，确保需求导向始终贴合技术赋能的实践场景，实现文化为科技铸魂、科技为文化赋能的双向奔赴。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首席专家）  
（原载4月13日《人民日报》）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增强乡村文化国际传播影响力

孙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要着力构建融通中外的叙事体系与传播格局，推动乡村文化的丰厚内涵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以可感知、可共享的方式抵达海外受众，增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

在全球化与数字媒介深度融合的当下，乡村文化以其质朴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深厚的情感张力，日益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的特色窗口。近年来，一批“村字号”IP加速走向世界，贵州“村超”“村BA”“村T”借助短视频平台构建全球传播矩阵，让乡村文化走进世界视野；江西王安文化周、四川自贡彩灯等通过数字化手段和国际化展览，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独特魅力。这些实践为我国展示乡村形象、讲述乡村故事、提升乡村文化国际传播力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也要认识到，乡村文化国际传播的整体效能仍有待提升。从内容呈现来看，一些乡村文化产品停留在自我展示阶段，对海外受众的心理和接受习惯研究不够深入，对目标市场文化语境的把握不足，导致传播效果不佳。就传播渠道而言，尚未形成自主可控的传播矩阵，对海外

平台依赖程度较高，议题设置能力和话语主动权有待加强。从人才支撑来看，缺乏既深谙乡村文化内涵又熟悉国际传播规律、掌握现代传播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基层传播队伍存在跨文化议题薄弱、数字技能不足等问题。就总体态势而言，乡村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尚显不足，亟待形成与中华文明深厚底蕴相匹配的文化品牌体系。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可从叙事创新、技术赋能、人才支撑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推动乡村文化国际传播影响力提质增效。

创新叙事激活情感共鸣。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文化内容自身的感召力，更依赖于传播方式与话语表达同受众心灵的精准契合，让人们在共通的情感中产生和加深认同。要坚持将用户思维融入乡村文化创新全流程，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受众的文化心理，根据不同文化偏好进行叙事调适。系统构建涵盖多元文化形态的叙事资源库，健全叙事效果的跟踪反馈机制，通过海外受众的互动行为数据优化叙事策略。深入探索不同类型乡村文化的叙事转换规律，多采用微观叙事呈现真实的乡村风貌与村民生活，将中国乡村的文化基因、生活方式等转化为易于海外用户理解和接受的语体系，向世界展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中国乡村图景。从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和情感需求出发，提炼乡村文化中的共同价值和文化内涵，以情感为桥梁打破文化隔阂，推动跨文

化传播有效落地，形成兼具文化辨识度与跨文化共情力的优质内容。例如贵州“村超”将侗族大歌、苗族芦笙与足球相融合，在体育竞技的共通语境中实现地方性文化符号的跨媒介转译，让海外受众在熟悉的赛事框架中感知中国乡村文化的独特韵味。

技术赋能提升传播效能。数字技术打破了乡村文化传播的地理局限，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技艺、风土人情等转化为具有全球性特征的视觉符号，推动乡村文化进入国际传播场域。强化技术赋能有助于提升乡村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水平，优化产品形态和用户体验。要大力加强数字文化资源建设，推动乡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与标准化建设，建立多语种、跨媒介的文化内容数据库，为国际传播提供持续、稳定、可调用的内容资源支撑。积极探索前沿数字技术在乡村文化国际传播中的应用场景，通过短视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打造虚实融合的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拓展受众的感知维度。例如，“一部手机游云南”平台依托全景和慢直播技术，将元阳哈尼梯田田景色推送到用户手机端，实现文化遗产的可视化传播，让海外用户突破物理空间限制，获得沉浸式文化体验。可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传播平台矩阵，深化与海外主流平台的内容合作与渠道共建，增强议题设置能力和话语主动权。运用算法推荐技术建立全球用户动态画像，针对不同区域受众的文化偏好实现内容精准分发，有效提升

传播的到达率与接受度。引导海外用户通过互动技术参与文化意义的再创造，推动乡村文化国际传播从单向传递走向价值共创，在双向互动中深化情感认同，实现乡村文化“可见可感”向“可信可亲”的跨越。

培育人才夯实发展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夯实挖掘乡土文化人才”。传播队伍的规模、结构及能力直接决定传播效能的提升空间。要着力构建乡村文化国际传播的立体化格局，推动媒体、文艺志愿者、村民等更多群体成为乡村文化国际传播的参与者、贡献者。例如，北京昌平下苑村聚集众多艺术家，形成“艺术+民俗”的文化生态，吸引许多海外游客到访并通过自媒体平台展现中国乡村的艺术活力。又如，云南保山施甸县乡村短视频博主“滇西小哥”以美食为切入点展现村民日常生活和乡村风貌，在海外社交平台圈粉众多。要加强乡村本土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持续拓宽人才选拔视野，注重发掘、培育乡村非遗传承人、“新农人”、乡村自媒体博主等新兴乡村文化传播力量，丰富人才储备。加大数字传播技能培训力度，帮助基层文化人才掌握全媒体内容生产与运营能力，适应数字时代的传播需求。加快建立跨领域人才协作网络，推动国际传播与文化研究、数字技术等领域的专业力量深度合作，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充分尊重和激发村民的文化主体意识，提升村民参与国际传播的主动性，让村民从被讲述者转变为讲述者，在传播实践中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最终实现从“人才支撑”向“主体自觉”的深层转变。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  
（原载4月8日《人民日报》）